

# 国家竞技观的演进：强种观、争光观、天下观

赵峰<sup>1</sup>, 宋继新<sup>1</sup>, 宋健<sup>2</sup>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2.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国家竞技观演进的趋势将由近代“强种观”到当代“争光观”，至未来的“天下观”。它将为推进国家体育战略由“强种战略”转向“强国战略”，向往“大同战略”提供了思想依据。其演进的历史背景是前提条件，学界认知是定性基础，社会需求是内生力来源，国家意志是定向主导。竞技天下观是“顺天、夺标、为民”的生态体育思想。其中，中华和谐思想与奥运和谐理念的融合是依据，是根基；“顺天夺标”是前提，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是“大道”；“夺标为民”是本质，守护的是社会规则，是“大德”；三者合一，是国人竞技思想升华、核心竞争力的聚集。创立竞技天下观，培育体育英才，提升国家竞技的境界，能够减少天人对抗，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为建设体育强国、维护世界体育秩序做贡献。

**关键词:** 竞技思想；强种观；争光观；天下观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1-0025-06

##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 view: The strong race view, the glory view, and the world view

ZHAO Feng<sup>1</sup>, SONG Jixin<sup>1</sup>, SONG Jian<sup>2</sup>

(1.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ngchun 130022, China;

2.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 view has been displayed from the modern "strong race view" to the contemporary "glory view," and also towards the future "world vieww' , and which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shift of the national sports strategy from "strong race strategy" to "strong nation strategy" and aspiring towards the "great harmony strategy."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evolution would be the precondition, academic recognition would be the qualitative foundation, social demand would be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the national willing would be the directional dominance. The competitive world view is an ecological sports ideology of "adapting to nature", "achieving excellence", and "serving the people". Of that, 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armony thought and the Olympic harmony concept is the main basis. "Adapting to nature and achieving excellence" is the premise, and also conforming to the natural way, which is also the “great way” . "Achieving excellence for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essence, which guards for social regulations, and is also the "great virtu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s the awakening of human athletic spirit, the sublimation of thoughts, and the gathering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Establishing the competitive world view, developing sports talents, and elevating the realm and pattern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ould reduce confrontation with nature and conflicts within societ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which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onstruct the sporting leading nation and to maintain the world sports order as the contribution.

**Key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thoughts; strong race view; glory view; world view

国家竞技思想，由近代强种观，转向现代争光观，是一次飞跃。它为聚民心、铸国魂、兴中华贡献巨大。但是，当下面对世界要和平发展，人类要建地球村，中国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竞技仍然强化单纯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生添彩”的种意识，淡化“和谐世界”与“为国争光”相统一的类意识，将会降低国家竞技文化建设的水准，甚至削弱其综合实力。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年体育科技专家研讨会”的综述中指出：“锦标主义乃至金牌至上一度左右着中国体育的价值取向，成为我们建设体育强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伴随着运动员的优秀赛场表现，我们并未呈现出同等震撼世界的文化表现和价值主张”<sup>[1]</sup>。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国家竞技观的演进趋势，努力提高体育文化建设的水准。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sup>[2]</sup>。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无本来就没未来。清华大学刘瑜<sup>[3]</sup>在《观念的水位》中揭示两个道理：一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取决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二是当人的“观念水位”提升后，其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故，探索竞技观的未来发展，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善待其历史。

## 1 近代“救亡图存”的强种观

### 1.1 历史背景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sup>[4]</sup>。近代，因西方列强欲殖民扩张，世界弱国要防御保种，故形成了强种的时代特征。当时，中国竞技体育观夹杂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被动从西方引进的。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悲情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强种观是为御防外侵，强身、强兵、强国，救亡图存的民族竞技思想。法国著名战略家博福尔<sup>[5]</sup>说：“战略就是思想方法。”强种战略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为了活下去的无奈选择。

### 1.2 学界认知

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学界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传习运动技术来强身、强种和强国的问题。当时，国内并没有明确的竞技思想。严复赴英国学成后所译《天演论》揭示了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规律，倡导只有发展体育、智育和德育才能“自强保种”<sup>[6][238]</sup>。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赴德留学归来，针对国内体育与竞技不分的问题，曾指出“运动(竞技)是体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体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全之人格”<sup>[6][251]</sup>。1927年东北大学吴蕴瑞留美回国后，提出了“身心一统、德技相长”的体育思想<sup>[7]</sup>。上述观点，皆体现了救亡图存的体育思想。虽然当时国内体育也存在“授技育人”和“重体轻育”的两种思想的争论，但“救亡图存”的思想占主导地位。

### 1.3 社会需求

近代西方竞技运动项目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由教会到大学，再到社会。教会具有传播运动知识和培养运动人才的职能，一般性活动先由外国人主持，后由国人自组。当时，国人主张通过体育强身、强种、救国。因此，人们在传习运动项目之时，并未理解其内涵是在有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自由、有序、审美、愉悦竞争，而偏重于传习其实用技术，但期盼通过运动“救亡图存”的愿望颇为强烈。

### 1.4 国家意志

甲午战争战败，震惊了大清朝野上下。力求改革的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影响下，欲通过引进西方与军事相近的体操和田径等运动，实现强种、强兵和强国的愿望。20世纪初，国民政府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强调运用运动技术强种、强兵、救国。在1928年第19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第一人宋如海，将奥林匹克误译为“我能比呀！”<sup>[8]</sup>，使中国自引进竞技当初就存在着文化的先天不足。1936年首次派队参加奥运会，颗粒无收，刺痛国人。由此，国家意识到，技不如人，无法夺标；而要夺标，就要培育技艺超群、身心强健的国民。如此强种，才能强国。故国家体育萌芽了救亡图存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

总之，近代中国竞技是在民族悲痛中，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竞技。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界认知、社会需求和政府主张的集合，逐渐合成了救亡图存的强种观和强种战略。

## 2 现代“夺标育人”的争光观

### 2.1 历史背景

现代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种意识”凸显的时代。因此，国家竞技选择了突出民族利益的为国争光观和体育强国战略。争光观是“夺标育人”的为国争光的民族竞技思想。体育强国战略是以强身、夺标、育人、争光为重点的国家体育方略。二者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悲壮地“站起来”的正确选择。

### 2.2 学界认知

新中国成立初，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国内知名体育学者吴蕴瑞、袁敦礼和方万邦等十分重视体育和竞技对人的教育价值。文革后，林笑峰等认为“竞技(sport)不是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体育不是竞技”，二者的本质、规律和目标皆有区别<sup>[9]</sup>。世纪之交，面对国家队长期重锦标、轻育人的问题，袁伟民<sup>[10]</sup>在《我的执教之道》中提出了“授技育人”的竞技思想，将中国女排推向世界六连冠。2005年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研讨会上，李富荣也提出“运动员培养首先是育人，然后才

是育才……”杨文轩等主编的《体育概论》指出:“育人夺标的训练理念,才是现代竞技运动过程的本质所在。这种育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是讲做人的教育寓于在运动训练过程之中,潜移默化的教育活动。”<sup>[11]</sup>珍藏于国际奥委会总部历史博物馆的《竞技教育学》一书中也指出:“竞技的本质是‘夺标育人’。夺标,具有工具理性,是竞技顶天所需;育人,具有价值理性,是竞技立地所求,二者合一,构成其本质。”<sup>[12]</sup>上述观点,被分别载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2004年的《体育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和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曾多次被国家、省、市多个运动队引用,为国家竞技形成“夺标育人”的争光观奠定了基础。

### 2.3 社会需求

国内的竞技争光观与体育强国战略的形成,并不是北京奥运会前后提出的,而是自近代“救亡图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固有的惯性。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其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政治主张,开展健身和竞技等活动,坚持普及大众体育,促进竞技水平提高;追求的是既通过参与运动,积极贯彻《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又希望广大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夺取锦标,为国争光。改革开放初,国家排球队在国际大赛中打了翻身仗,社会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此时,国民十分期待通过竞技,取得优异成绩,提高民族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以此满足其存在感和认同度。这些皆促进了竞技争光观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形成。

### 2.4 国家意志

新中国成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情,原国家体委提出中国竞技要通过参与世界大赛,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获取国际地位等思想;后来又提出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生添彩”的理念。20世纪末,国家体育总局又提出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11年《关于以国家短道速滑队事件为鉴开展专项整顿教育的通知》指出,各级运动队不仅要重夺标,更要突出“全面育人”的思想。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并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sup>[13]</sup>。钟秉枢在《新型举国体制:体育强国建设之保障》中指出,“新型举国体制要把争光与育人结合起来,既看运动成绩,也看超越自我;既看竞技体育的金牌;也看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sup>[14][185]</sup>。上述思想的演进,为“夺

标育人”的争光观与体育强国战略的形成起到了定向的作用。

## 3 未来“夺标为民”的天下观

### 3.1 历史背景

世纪之交,人类面对争端四起的国际环境,提出要由“革命与解放”转向“和平与发展”、由“对抗”转向“合作”;开始反思误用理性引来的天灾人祸,欲求共建“地球村”,推动“全球化”,应对其害;并深度思考国际竞技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已有异化的倾向。为此,前任奥委会主席罗格又提出了奥运要“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新理念<sup>[15]</sup>。以上这些思想动态,皆为构建“夺标为民”的竞技天下观(简称天下观),研究体育“大同战略”提供了依据。

### 3.2 社会需求

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社会的竞技价值取向,由单一的“为国争光”转向“多元惠民”,即竞技的政治工具理性在减弱,人文价值理性在增强。李在军等<sup>[16]</sup>认为“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分水岭,国民对金牌的关注度,开始向‘运动员健康’和‘举国体制’等问题转移……由此国民心态,能推进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步伐,其中‘强’,不是量变,是质变,是以全民强健为特征,体现国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这是扭转了竞技体育等于金牌的价值导向”,竞技“要以提高运动员综合素质为主线,着力提升其软实力,创新其教育方式”。李晓莉等<sup>[17]</sup>认为,“健康重于金牌的人性化理念,在北京奥运会上得以诠释……几乎与奥运共生的爱国主义,在本届奥运会期间,并没有那么高调”,媒体少了很多为国争光媒体的报道,少了很多“为国争光”的字眼。马连鹏<sup>[18]</sup>指出“北京奥运会后,竞技价值取向由‘单纯化’转向‘多元化’。20世纪末,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一方面继续为政治服务,强调通过奥运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多元化发展”。当下,伴随国力的提升,优秀运动员从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转为大众的“青年偶像”。体育的政治功能逐渐在减弱。以上说明,自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社会的体育价值取向,由单一为国争光的政治价值取向,逐渐转到面向社会多方位服务的“多元”的人文价值取向,这为研究天下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 3.3 国家意志

近年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面对国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需要,国家竞技思想将由“争光观”转向“天下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一起向未来”,以及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奥委

会主席巴赫时说：“世界各国与其在 190 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美好未来”“中方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sup>[19]</sup>。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最初提出“合作共赢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可见，“合作共赢”就是其“初心”，是其本质，而竞技天下观和体育“大同战略”皆以其为指导思想，以求为维护国际体育秩序做贡献。本研究提出的国家体育“大同战略”是顺天健身、资源共享、普惠天下的方略。据著名学者周有光考证，孔子曾将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大同，国体是“天下为公”；后期为小康，国体是“天下为家”。但是，历史证明，建设理想国，小康是现实，大同是理想。这是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已经探索的课题。故周有光说，“今日中国，建设小康，志在大同”<sup>[20]</sup>。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sup>[14][11]</sup>。上述思想皆为研究天下观，探索“大同战略”奠定了基础。

### 3.4 学界认知

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杨桦等在《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问题研究》一书中，也表达了与本研究类似的观点。他们主张“要用世界眼光对中国体育诸多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思考”<sup>[21]</sup>。2013 年杨文轩等<sup>[11]</sup>主编的《体育概论》指出：“中国体育文化要顺应‘世界一体化’，首先需要借鉴、吸收先进的西方体育文化。面对强势体育文化的传入，处于弱势的体育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面被替代，而应当有选择地吸收强势体育文化的精华部分，以和谐的方式加以消化吸收，并融进自己的体育文化之中，使之适应本国、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种“世界一体化”的体育思想，其实质是国家体育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就是一种“天下观”。2022 年程志理<sup>[22]</sup>指出“体育属于人民”“培养巅峰运动员，推动体育科学的发展”，应“与全民健身保持一致，有效促进全民健康”。同年，在首届“天坛文明对话暨世界文明与奥林匹克论坛”上，易剑东<sup>[23]</sup>探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中央党校董振华在为中国《问道：强国之路》丛书作序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世界大同的和谐理念，主张建设各美其美的和谐世界。为世界谋大同，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sup>[14][11]</sup>。

钱穆等<sup>[24]</sup>认为：“文化指的是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我们基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的共识，提出其本质是创造财富，并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误用理性与自然对抗，使天灾人祸日渐增多，皆是“逆天创富”的文化所致。据此，他们将未来顺应自然、和谐社会、造福人类的文化，称为“顺天创富”的新文化，并指出“顺天”是顺应自然求生存，是“天道”；“创富”是适应社会求发展，是“人道”；二者合一就是“天人合一”，但后者必须要服从前者。故，未来“顺天创富”的思想，不仅是人类体育的准则，更是整个社会生存的“法则”。否则，“本”不存，“标”何在？故人类社会将由“物本位”到“人本位”转向“天人本位”。在这个时代，生态文明将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文明。故，如果说“顺天创富”的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天理”，那么“顺天夺标”的竞技将是人类体育的“大道”。故总结上述历史和文化理念的变迁，为研究“天下观”，处理好对竞技资源的使用和修复、竞争与合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竞技天下观是“顺天、夺标、为民”的生态体育思想。它将国家竞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生添彩”的“种意识”，提升到为天下人服务的“类意识”，是国家竞技核心竞争力的再聚集，是人类竞技思想的升华，有 3 个特点：

#### 1)情理合一，彰显人性。

汉语中的“人性是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在竞技天下观“顺天、夺标、为民”的思想链条中，“顺天”是顺应自然，是竞技面向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夺标”是夺取运动锦标和人生的奋斗目标，以适应种族所需；“为民”是为国民和世民服务，以满足人类体育所求，其中，前者具有“民族情感”，对内能产生凝聚力；后者具有“世界理性”，对外能产生感召力；二者结合是“为国争光”与“和谐世界”的统一。它能促使国家竞技更有理性，更有世界情怀。余秋雨<sup>[25]</sup>说，“大唐之大，大在胸怀，大唐之强，强在文化”。竞技天下观之大，大在其主体由“种族”放大为“人类”，体现的是“世界一家人”。它不是中国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的“家天下”，也不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君臣的“国天下”，而是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类天下”。竞技天下观，把“民族情感”与“世界理性”统一，升华了神性，彰显了人性。它是一种类意识——体育的大爱。

《何谓文化》道出：“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全部推倒。”<sup>[26]</sup>例如，2024 年 4 月 20 日，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中国厦门站比赛中，内敛、自信、顽强的瑞典运动员杜普兰蒂斯，以 6.24 m 的成

绩, 打破了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在他准备最后一跳前, 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发生了: 在场所有参赛选手都主动停赛为他加油, 全体观众用同频共振的掌声为他鼓劲。在他即将出发时, 场上又极为肃静, 此时的观众、对手、裁判等已经和杜普兰蒂斯融为一体, 蕴势待发。这不仅表现了参赛者对竞争对手的尊重, 而且也展现了人类超越国界、种族、文化的“大爱”。成功后, 人们又是欢呼雀跃, 掌声雷动, 已经忘记了“我”, 为谁而“战”, 为谁而“看”。人群中的每个“小我”, 已被集体的“大我”同化为“无我”。这, 已不是杜普兰蒂斯的个人赛, 而是人类无我的集体的大赛, 是“天下竞技”。这就是竞技天下观放大主体, 彰显人性, 追求的理想。赛后, 杜普兰蒂斯说“这场比赛, 正是有对手和同伴的支持, 观众和工作人员的鼓励, 使我忘了得失, 只有力量。今天的氛围真棒”。

### 2)顺应自然, 保护天性。

《汉语词典》中“天性指人先天具有的品质”“天赋是指自然赋予人的资本”。在天下观“顺天、夺标、为民”的思想链条中, 以“夺标”为中介, 构成“三大链接”: 第一链接是“顺天夺标”, 是自然选择, 是天下观的前提, 遵循的是“自然法则”, 是竞技的“天道”。第二链接是“夺标为民”, 是社会的选择, 是竞技天下观的本质, 守护的是“道德法则”, 是竞技的“人道”。第三链接是“顺天、夺标、为民”的整体链接, 是将“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统一的“抉择”, 是中华和谐思想与奥运和谐理念的融合, 是竞技天下观的主要依据, 是“根基”。其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未来人类高水平的“生态竞技”必然要经受自然与社会的“双向选择”, 否则不然。二是因为《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指出“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 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sup>[27]</sup>。其核心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其理想是追求社会的“秩序”(和平)。同样,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崇尚和谐, 追求秩序”的特征。如, 儒家的“中庸之道”, 道家的“道法自然”, 佛家的“普度众生”, 都蕴含的和谐与秩序的意识。它与奥运和谐理念集合, 是竞技天下观创立的思想源头。以上竞技天下观的“三大链接”是人类竞技的灵魂觉醒、思想升华、核心竞争力的聚集。其中, “顺天夺标”是从人类的心理和生理上保护、顺应、开发人竞技的“天性”及“天赋”。

首先, 从生理上保护人竞技的“天赋”。人类竞技的“天赋”是最珍贵和最稀有的资本。人若损之, 逆天而行, 生存之灾, 发展之患。亟待用“顺天夺标”的思想, 处理好对竞技资源的使用和修复、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以求解决人体有限承受能力与社会无限需

求的矛盾, 从而维护人体内外的健康秩序。

其次, 从心理上保护人偏好“竞争和娱乐”的天性, 解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失衡”的问题。历史曾告诫我们这个民族苦于缺少竞争的血性, 导致古代几次种族之爭败于外族, 现代体育竞争又多次输给弱国, 甚至有失国格及人格。故天下观的“顺天夺标”, 提倡保护和开发人“竞争和娱乐”的天性, 是弥补民族血性不足的缺陷, 彰显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它是天下观的前提, 是人类竞技的“天道”。其依据的核心理念是道家的“道法自然”, 即“道”是自然生成的, 要效法和顺应自然<sup>[28]</sup>。当下, 它已是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大道。天下观遵循其“大道”, 有助于实现老子强调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能量放大效应, 以求放大竞技个体有限的自然力和无限的精神力, 去创造奇迹<sup>[29]</sup>。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先后指出, “人类应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些皆为我们研究天下观指明了方向。

### 3)夺标为民, 弘扬类性。

首先, “夺标为民”是天下观的本质特征。因为“夺标”是竞技的现实需求, 体现的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理念, 具有工具理性。“为民”是为世界人民服务, 是竞技的终极关怀, 彰显的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sup>[15]</sup>的奥运理想, 具有价值理性。“夺标”与“为民”合一, 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反映了天下观的本质属性。

其次, “夺标为民”是“夺标育人”的升级版。因为“夺标为民”, 通过“夺标”不仅要育人, 更要推进世民的健身、竞技、产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这说明它不仅有其特性, 而且还有其普适性和共享性。所谓共享性是人类对待体育资源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例如, 近年来, 国际奥委会允许跨国联合的办赛和归化运动员参赛的资源共享。

再次, “夺标为民”把竞技的主体由“种族”放大为“人类”, 有助于促进人的“心大、力大、事大”, 其中, 心大是放大思想; 力大是增强心力; 事大是做大事业。其依据是心理学“认知-情感-行为”的理论<sup>[30]</sup>, 即当人对事物认识的水平越高、越深刻、越彻底(心大); 产生的情感就越强烈(化学反应), 精神力量就越大, 行为就越自觉、越有动力(物理变化), 事情就越做越大。国乒为何不败, 源于有“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你不要这一局, 祖国人民要这一局”的境界(心大); 有“一切从零开始”“不到最后不服输”的强大的心力(力大); 最终创造了半个世纪长盛不衰的辉煌(事大)<sup>[31]</sup>。

简言之，竞技天下观的特点是：情理合一，彰显人性；顺天夺标，保护天性；夺标为民，弘扬类性；三者融合，是人类竞技的大道、大德、大爱的集合。它能使人类稀有的竞技天赋，赋予高贵的思想，产生非凡的行为。总之，上述学界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体育，以及为世界谋大同的政治理念，具有广泛共识，皆为研究天下观和“大同战略”奠定了基础。

### 参考文献：

- [1] 立体育改革潮头 发思想理论先声 继承改革开放40年[N]. 中国体育报, 2018-07-23.
- [2] 王媛. 龚自珍[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22.
- [3] 刘瑜. 观念的水位[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4] 张伯苓. 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J]. 基础教育, 2006(5): 30-31.
- [5] 博福尔. 战略入门[M]. 杨褐仪, 译.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 [6] 谭华. 体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7] 章兴耀, 顾渊彦. 吴蕴瑞体育教育思想探析(上)[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2): 117-119+122.
- [8] 张鲁雅. 世纪情——中国与奥林匹克[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21.
- [9] 于文谦. 《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的启示[J]. 体育学刊, 2009, 16(12): 13-15.
- [10] 袁伟民. 我的执教之道[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8.
- [11] 杨文轩, 陈琦. 体育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96.
- [12] 宋继新. 竞技教育新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4.
- [13] 胡锦涛在奥运会总结表彰大会讲话[EB/OL]. (2008-09-28)[2024-06-20]. [https://www.gov.cn/lhd/2008-09/29/content\\_1109754.htm](https://www.gov.cn/lhd/2008-09/29/content_1109754.htm)
- [14] 北京体育大学课题组. 建设体育强国[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2.
- [15] 雅克·罗格. 奥林匹克评论[M].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 2001: 卷首语.
- [16] 李在军. 当代竞技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研究[M]. 长春: 东北师大出版社, 2021: 103.
- [17] 李晓莉. 建国后中国竞技体育思想发展历程及趋势[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2: 125-126.
- [18] 马连鹏. 我国竞技体育思想历史变迁及创新研究[J]. 安徽体育科技, 2012, 33(2): 1-3.
- [19] 共同的梦想 共同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成功举办冬奥盛会 [EB/OL]. (2022-04-08) [2024-06-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08/content\\_5683962.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08/content_5683962.htm)
- [20] 周有光. 静思录[M]. 北京: 人民艺术出版社, 2012: 89.
- [21] 杨桦, 池建. 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6.
- [22] 程志理. 论体育属于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基本理念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9(6): 513-517+560.
- [23] 易剑东. 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EB/OL]. (2022-11-25)[2024-06-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456664482268483&wfr=spider&for=pc>
- [24] 黄克武. 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J]. 南京大学学报, 2017, 54(1): 68-78.
- [25] 余秋雨. 文化苦旅[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
- [26] 余秋雨. 何谓文化[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27] 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宪章[M].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 2001.
- [28] 老子. 道德经[M]. 张景, 张松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29] 老子. 道德经[M]. 陈阳, 译.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6: 182.
- [30] 班杜拉.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学基础[M]. 林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1] 国家体育总局课题组. 星光灿烂 40 年: 乒乓文萃选[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